

五四八年

观察

第四卷

第一一十三期

觀察

· 元千五萬一售 ·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一第 卷四第

專論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

張東蓀

雖然對立不見得就有戰爭

周炳琳

歐洲與美援

Victor Perlo等

新德里通信

甘地之死

嚴紹端

甘地與新印度

嚴紹端

從戰局看政局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陝晉戰局與胡宗南部

淚眼看東北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北平學生又被捕
觀察特約記者

週末闢欄

世界之兩極化

何永信

通信

關於日本復興會不會

威脅中國

費孝通

書評

國民所得

陳振漢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月個三)		(月個六)	
平寄	十五萬元	平寄	三十萬元
航掛	十九萬元	航掛	三十八萬元
平寄	二十萬元	平寄	四十六萬元
航掛	二十四萬元	航掛	五十二萬元

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再版中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再版中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裝訂中
售價：每冊十五萬元	
郵費：掛號每冊五千	
航掛每冊七萬元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一千八百萬
普 全面一千五百萬
半面八百萬

通 全面四百五十萬
半面四百五十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掛：附郵一萬元
航掛退：一萬五千元

讀者投書

遼陽之失

編者先生：遼陽終告失守。這消息是由官方報紙在二月九日發表的，謂守軍已於七日轉移陣地云云。據由遼陽逃出的難民說，共軍炮火猛烈，攻城的兵力超過國軍六倍之多。有六個縱隊。一月卅一日，遼陽郊外村鎮便有小接觸，當共方發覺守軍兵力薄弱不足一萬時，便由四日起，集結兵力，展開攻勢。炮火異常猛烈，國軍所據城郊工事完全被毀，不得不退守城廂。共方繼續以炮火向城廂發射，東關及南關一帶民房大部燬於炮火，老百姓死傷很多。守軍曾一再向遼陽求援，然當時遼陽郊區二三十里一帶的地方，如蘇家屯、東陵等處，時常發現小股兵力的竄擾，而且共方早就喊出到『遼陽過年』的口號，這也許是神經攻勢，可是國軍方面恐怕『顧彼失此』，遼陽區畢竟較遼陽為重要，所以遼陽未能得到援軍，受不住重大壓力便失守了。共軍是在舊曆除夕正式進佔遼陽的，進城後對守軍尉官以下的兵士，欲回家者各發二千元邊幣遣散，老弱殘兵則概不收容，校官以上的軍官押送共軍後方受訓。攻打遼陽的兵力據說是最精銳的，兵士多半是強健的山東大漢，裝備也很整齊。

遼雲風 二月十七日 瀋陽

競選費用的統計

編者先生：爲了選舉「國代」「監委」和「立委」，全國各地整地熱鬧了三個多月。競選者，花樣百出，各地報紙雜誌，已有不少報導。三種當選人名額，一共三千多名。競

選者約有八千人，每人直接和間接的花費平均十億元，總數就是八萬億元（八字底下十二個零，一個天文學上的數字）。假使把這一筆錢換成一元一張的法幣，它的長度：可以圍繞地球三萬圈

面積：可以鋪滿整個的浙江省

體積：可以把整個的上海市區埋在鈔票堆裏，只有極少數的尖塔露在外面。

重量：八百萬公噸（所需要的運輸工具是萬噸自由輪八百艘，或火車二千七百列，或大卡車二百六十萬輛。）

假使把這一筆錢拿來做別種的用途，它的效果是：

如果用於建軍，可以購置：

戰鬥艦二艘或
航空母艦三艘或
巡洋艦六艘或

驅逐艦二十艘或
潛水艇十五艘或
飛機五百架或

戰車五千輛或裝備
機械化兵團四個

如果用於加強運輸，可以購買：

輪船四百艘或
火車一百五十列或
汽車三萬輛

如果用於建設，可以修建：

從上海到北平的鐵路一條或
從上海到迪化的公路一條或
優良的海港兩處或

巨型水力發電廠兩座或
小型發電廠和自來水廠一百座（可使一百個城市的市民享受到水電的設備）或

生產民生必需品的工廠一百五十座或

灌溉十萬畝的農田水利工程一處或
相等於上海百老匯大廈的房屋八十座（可以解決房荒，杜絕以金條頂房屋的陋規）

如果用於救濟方面，可以：

使全中國十分之一的人民每人有一套衣服穿或
使全中國一半之二的人民不必工作而坐吃一餐

現在選舉的主潮已經過去，喜者自喜，悲者自悲，但是當事者誰又體驗到這是多大代價的一筆浪費呢？

何少逸 一月廿七日 台北

徐州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徐州已成恐怖世界了。近接徐州親友來信：『從十八號就開始抓壯丁，直到現在還是抓，抓，抓得烏煙瘴氣，哭叫連天。這一次「徵兵」並不按照法定手續辦理。既未宣布名額，也不舉行抽籤。不問免役緩役，也不論弟兄幾人，更無所謂是否「中籤」，就是不分皂白地亂抓一氣。凡是十八到廿五歲的小夥子，正合所謂「黃巢殺人八百萬，在數一人也難逃」。而且是三更半夜地抓。西關有一家，新婚的晚上，新郎被抓去了，新娘跳河自殺。』徵集處「只見年青人捉一批，放一批，誰也不知那天才足額。保甲長們藉故大事勒索：但如用些錢，便有人可以保釋；就是抓了進去，他們也可以約集同伴去打「徵集處」，死拖活拉地把人搶回來。……徐州密邇京畿，通都大邑，並非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現又正在開着「四省綏靖會議」，這種亂來，「上峯」不至一無所聞。當局口口聲聲要安定，要安定社會秩序，現在這個樣子，真不知是在「戡亂」還是一「添亂」？

苗×× 一月廿八日 南京

青島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本月三、四日，青島市區突有武裝軍人，沿途大抓行人，凡青年壯丁，不問青紅皂白，均被裝上大卡車，載赴碼頭。被抓壯丁，約五百餘人，據說載赴

烟台，補充士兵。因爲真像難明，以致人心惶惶。憲法第八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或拘禁。在此行憲開始的時候，保障人權？還談甚麼法定程序？青島是十一級特區所在地。特區是膠東軍事總神經，一切軍事行動，皆受其指揮。軍事是整個的，沒有上級命令，不得單獨行動。被抓壯丁家屬，聯合至該區請願時，該區表示，「本區未悉抓壯丁事，既有此事，定嚴行查究」。部隊在財賄之下，亂抓壯丁，當局猶推諉不知，誰能相信？

郭澤鳴 二月六日 青島

南昌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一向尚能寧靜的南昌，今日也在不寧起來。爲了「戡亂」，一批一批的小伙子徵了去。現在南昌又在「人力動員」正在高中畢業的學生也要去，政府所謂不受普通兵卒徵召的高中畢業生也要去。到了晚上十一兩點鐘，幾個雄糾糾的槍兵會同各保甲長，挨戶捉拿，拿捉停當，即將該批裝入預備好的汽車，一直開往不知去向。爲了這樣，南昌人心惶惶不安。凌之上 二月三日 南昌

關於工作母機

編者先生：讀貴刊三卷十期史超禮君「美國的機器」一文及三卷十九期陸家徵君「關於美國的機器」一函後，覺得都有一些小疑問，就奉詢武大董大猷教授的意見，以釋吾疑。當時董先生曾作了一些比較的回答，茲錄於後，以供同好者參考。

Machine Tools 一詞之譯義爲「製造機器的工具」，但一切機器均具有「工具」作用，如織布機是織布工作的工具，軋鋼機是軋鋼工作的工具，鍋灶當然是（下接十八頁）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的發言，自負其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周炳琳：北京大學教授
嚴紹端：印度全印廣播公司任職
何永信：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陳振漢：北京大學教授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

張東蓀

近來大家對於自由主義大感興趣，都來作熱烈的討論。我慚愧得很，大公報上有幾篇文章未曾拜讀，因為近來已不訂閱大公報了。雜誌與日報都很有好文章；只可惜現在的人財力有限，實難遍購。所以我所見到的大都是贈閱的。我的見聞雖有限，然而在直覺上似乎自由主義已成目前爭論中問題的焦點了。就我個人論，在拙書中雖再三強調主張自由在文化與政治上之重要，但卻從未自居為自由主義者。因為在我看來，自由與自由主義在涵義上不是完全相同。其他別種主義者亦並沒有否定自由，甚且亦很強調自由之重要，但卻不稱其主義為自由主義。可見自由與自由主義，這兩個名詞並不完全相同。根據這一點，我現在亦來湊熱鬧一討論自由主義。恕我先把自由主義分為兩種：即政治的自由主義與文化的自由主義。我並不是主張兩者絕不相關聯，不過在看法上我們確應得有些區別。

我向來寫文章喜歡先把結論列在上頭，然後再加以說明。現在我亦用這個方式。關於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我的結論是如下：

政治的自由主義在今天廿世紀已是過去了。

在上文已說過，自由主義與自由並非一件事，則我們當知現在說政治的自由主義已成過去却絲毫不含有否定自由的意義在內。所謂政治的自由主義就是單純的自由主義，亦可以稱之為舊式的自由主義。這種主張如在中國求其實例，則莫適當於民初的憲政論。民初時代的政治意識大家或許不會完全忘却，似乎不勞我在此短文中詳舉。這種民國初年的憲政主義決不足為今天戰後立國與建設之方針。梁漱溟先生那篇文章的要點為我所同意的就在於他能毅然揭穿這個緣故，說明憲政主義式的自由主義不足為今後立國建國之依據。至於他還有正面文章，說到中國文化的特質，那是他個人的見解，與我完全不相干。我們必須承認他在消極方面說穿民初的憲政主義在今天又復活起來是不行的，這一點確有價值。我為文表示共鳴亦只注重在這一方面。我把選舉與飛機鐵路視為同樣的例證。同是西方文化上的好東西，一到中國來便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我却並沒有主張不要這些東西進來。我只說明其故不在這些東西本身而在於中國有個壓迫人民的統治上特殊勢力。倘這些東西一進來而不為這樣的特殊勢力所獨佔，則依然是好東西。據有人告訴我某大學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立刻作文反駁，說飛機鐵路不可反對。好像在今天的中國知道西方文化之重要的只有該文作者一人；好像用復古的罪名就可輕輕把替人民訴苦的呼聲抵消。立言雖巧，總不免有替特殊勢力維護的痕迹的嫌疑。我起初頗相信自由主義總不致有何流弊；乃近來愈看所謂自由主義者（即自稱自由主義者）的行為，使我不得不承認這其中確有一點兒問題。

原來自由主義是歐洲十八世紀幾個學者所提倡的一些原理原則。這些原理原則用之於文化，用之於政治，遂形成現在的西方民主國家。這種自由主義之要點在於建立個人價值，成為個人主義的文化（其詳我另有一文已投中國建設月刊），個人主義在於養成個人的責任心與自尊心，在原則上絕對與平等無衝突。須知從封建社會把個人解放出來却非用這種個人主義不可。所以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建立個人主義的社會，從歷史上看，乃是一件空前的功勞。其價值真可謂與日月同光。所不幸的只在於後來由經濟方面發生了漏洞。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盛行時，在經濟方面當然是放任。須知放任政策在資本主義的初期是確有功勞。因為能夠助長生產，使資本主義得以形成。而初期的資本主義又確能增加財富，不會引起人們的反對。不料就因為這個放任經濟的緣故遂致資本主義長成了，資本主義愈長愈大，其弊乃見。對內愈見貧富不均；對外

愈趨於侵略。政治離不了經濟；經濟或反為政治的主幹。於是政治的自由主義就為放任的經濟之故，演至今日，已百孔千瘡了。

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推車撞壁之時，而謂中國猶能如西方在十八世紀時一樣，實行政治的自由主義，豈非太不了解時代麼？所以我說自由主義如專就政治方面（經濟當然包括在內）來講，已是過去了。我嘗說中國是錯過了文化階段。假定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實行憲政，提倡這樣單純的自由主義，實在是太好了。事實既不然，則我們便應另有打算。但須知我並不是以為自由主義不好，乃只是說這個還是不夠。現在西方人們有些提倡自由的社會主義；有些提倡社會的民主主義，足見單純的自由主義已經不夠了。這是全世界的趨勢。關於政治的自由主義似乎不必多說，請即接着來講文化的自由主義。講完以後，再將二者聯合在一起來討論一下。關於文化的自由主義，我亦願先提出結論如下：

文化的自由主義是人類文化發展上學術思想的生命線。中國今後要吸收西方文化，進一步要對於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更不能不特別注重這個自由。

所謂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却和政治的自由主義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可以形成一個黨，或名為自由黨，或名為民主黨。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並不須有固定的內容。只是一種「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何種學說或思想，只要由嚴格的邏輯推出，有充分的事實為證據，換言之，是由於科學方法而成，則都可為文化的自由主義者所承認。現在大學中只講正統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於不顧，這不是文化的自由主義之精神。反之，假定推翻了現行制度，而如對於正統各種思想加以屏棄，這依然違反了文化自由。所以文化的自由只是一個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容忍的態度。沒有一個學說與思想不可以批評。牛頓的定律在五十年前是金科玉律；倘若阻止人們對它的燦爛成果。同時，亦沒有一個學說或思想不可以容忍。只要言之成理都應加以承認。總之，在文化自由上根本不能有「邪說」，亦不能有「一尊」。只有研究的所得而無開始的信仰。無一前提不可轉為研究的對象。這樣的精神確是西方文化在人類上的唯一優點。中國在未與西方文化接觸以前就沒有這個優點。現在既與西方文化接觸了，雖然有些傳染，但終嫌尚未十分接受。今後中國如果要想在文化上立足則非大大向這一方面推進不可。

於是我們應得合併在一起討論了。現在的論壇上總是爭論甚麼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之關係；有的說二者有衝突；有的說二者本相一致。在我看來，都沒有鞭辟近裏。他們只用自由與平等二個範疇。殊不知還有第三個範疇，是「生產」，却必須加入在內。無論如何講自由，講平等，若與生產發生衝突，換言之，即使生產反而降低，則決不能成功。而況在現在正值大戰以後，各國都有迅速增加生產之要求。這是一個普遍的趨勢。中國決不能例外。所以在自由與平等的打算中必須把生產列為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因素。這不僅現在為然；歷

史亦給我們以教訓。歐洲近百餘年以來社會主義的試驗不止一次，或用革命的方法，或用立法的方式，凡讀歷史者當可知之。我們可以說百餘年來歐洲社會主義的排演是一部悲慘的歷史。這個悲慘經驗所給人們的教訓是：凡社會改革（或革命）而能使生產增長的就能站得住；反之，使生產降低則必會被反革命所推翻。蘇聯的經過尤為顯明：革命之初的戰時共產制就因為不能滿足增產的要求以致維持不下去了，乃不得不改為新經濟政策。如新經濟政策永久下去，則革命雖成而社會主義却失敗了。幸而有計畫經濟。可見計畫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救命湯。換言之，即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相結合乃得到新的生路。須知計畫經濟是一個中性的名詞。資本主義亦可有計畫經濟。法西斯亦有計畫經濟。可見不是所有的計畫經濟都是進步的。對於經濟加以計畫要用甚麼原則去計畫。資本主義的後期亦在那裏講計畫，但却依然用着資本主義的原則。所以必須用社會主義為原則以作計畫方能成為進步的計畫經濟。用計畫經濟以增加生產遂使社會主義站得住，這乃是蘇聯對於人類的一個無上之貢獻。蘇聯的成功即在於使增產為目的的計畫經濟與社會主義結合。已往社會主義種種試驗都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只注重於平等而忘了生產的重要。

中國今後必須採用計畫經濟，恐怕已為大家所公認。因為只有這樣方能大量增產。但為了增產必須先排除其障礙。官僚資本，豪門資本，是障礙之一。地主與放高利貸的是障礙之一。所以廢除這些，不完全是從平等着眼。如果專從平等來看而忘了增產上的需要，這是錯誤的。尤其是在產業落後的國家，不把這些封建殘餘勢力去掉是無法使產業發達的。（不過中國還有一個特別情形：即除上述兩種人以外尚有一種人，即流氓是也。普通所謂無產者是指無財產而從事於生產之人，如佃農與雇工之類。中國的流氓確是無產者，但却不從事於生產，以敲詐為生。這種人只要求在享用上得平等。其實正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所以如果不把這種人加以改變，其為增產之障礙亦與上述者相同。因為本文不在討論這些問題，故只在括弧中附帶言之。）至於如何製定計畫務使在其中保存儘量的自由與相當的平等，那是製定者的事，非本文所能詳論。

說到這，我們便見到問題的中心了。為了生產既須用計畫經濟，須知在經濟方面要有計畫，則勢必連帶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所以就因為經濟的計畫性必須把全社會亦成為有計畫性的。我們為便利起見，可稱之為計畫的社會。在這樣的計畫社會中，試問自由有無限制，平等是否損害？我以為論者們主張經濟平等必使政治自由有虧，固然是只知二五不知一十之言，但說經濟平等了以後自由更可增加，亦非探本之論。老實說，一談計畫，如果社會有計畫性，則只能有計畫以內的自由與計畫以內的平等，而斷不容有超計畫的自由與超計畫的平等。計畫是以增加生產，使全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為目的的，則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產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產降低，則都應該在限制之列。論者以為自由平等本身有問題是錯誤的；須知問題只在產業不發達的民族必須把生產加入於自由平等之中。一班刊物上有流行的說法，說

甚慶英美有政治的民主而無經濟的民主，蘇聯有經濟的民主而無政治的民主，都由於不明白這個情形。還有人說中國應該二者都要。其實這只是一句漂亮話，根本沒有用過一番分析工夫。

根據上述的話，應知自由在今後的中國確有問題。平等更然。我希望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們不要看得太簡單。我對於這個問題却有一個答案。我嘗說，就人類言，最理想的是一個民族經過充分個人主義的陶冶以後，再走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路。可惜世界上沒有那麼一回事。我又嘗說，中國沒有經過個人主義文化的陶冶而遽然來到二十世紀是一個遺憾。現在不必說這些空話。就實際來說，中國已經到了這地步田地，當然無法追究既往，亦沒有法子倒退。不過亦未必是絲毫無辦法。現在用一個不十分切合的比喻。譬如入大學最好是中學畢業。無如有一個人，中學未畢業，而現在竟在大學中勉強讀書了。我以為最好的辦法是他把大學的功課少選一些，留下一點兒時間來補習中學的必修科目。我用此比喻來說明中國今後的情勢。中國為了增產必須採用計畫經濟，尤其必須採取進步的計畫經濟，但經濟方面一有計畫勢必不能讓其他方面仍留為無政府狀態的絕對自由。就中以教育一項而論，就不能不大加改變以與計畫相配合。政治經濟教育等全體如有了計畫性，則我們今天放任慣了的人必會感到很不便。這一點恐怕我們心理上應得準備自願犧牲一些不入格的自由方好。這即是我用大學功課來作比喻的。至於補習中學一層，即是我所說的文化上絕對自由。須知在計畫社會中政治經濟等是沒有絕對自由了，但我們還不能不要絕對的自由。這個絕對的自由應該在文化與思想方面。如果社會因具有計畫性而有些呆板，則我們尚留一個絕對活潑的田地在其旁邊。老實說，社會的計

雖然對立，不見得就有戰爭

周炳琳

近來在中國，「兩個世界」之說頗為流行。這話本是從「美蘇對立」說起的，不經意的便說成「世界成了兩個」。作這種議論底人心中橫着一個戰爭底暗影，大概不久便要進一步發出「第三次世界戰爭底到來只是時間問題」底議論了。這種說法有很壞的影響，至少助長一個不長進的心理，那就是：「沒辦法。世界都成了兩個，人類底互相殘殺如何能免？我們中國現方進行着底內戰來頭大的很哩！有些人還在希望重見和平，唉，勸他們還是收拾起好夢來！」可能並助長一個比這更為醜惡的心理，那就是：「世界局勢這樣分曉出來，好極了。我們的內戰本就是『戡亂』；在對立的世界中，我們的是前哨戰。美援必會源源來的。打下去，打下去，能打下去便有辦法。」這後一種心理是希望禍端得更大，我們好從中沾便宜。但是，朋友，且慢高興。世界和平底放

畫性只是為了生產，總是有時間性的；一個計畫完成以後必須增改。所以社會的一時固定乃是一種不得已的事，亦並無絕對的可怕。但却必須在固定中留有一個變化的活力可以發生的餘地。這就是文化方面的絕對自由。我主張在這一方面使中國養成良好的自由傳統，充分培養個人主義的良好方面。此即我所謂補習中學功課是也。本來在西方亦是自由主義的根底本在於文化。文化上沒有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決無法建立自由主義。中國今後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這個自由精神的大統。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種子未斷，將來總可發芽。所以便這二者（即計畫的社會與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思將來沒有更進步的制度出現。

話幾乎說完了，不妨再向所謂自由主義者進一言。大家如認定上述的分析是對的，便應力爭計畫內的自由與平等，但不可仍留戀於未入計畫以前的自由平等。如實在真愛絕對的自由，則應向文化方面努力。我說這些話，主旨在把這個問題中的幾個關鍵弄清楚。其實這些話並不是現在想起來的，乃是久已想到的，至於說出來以後，任何一方面認為是不入耳之言，那我就不管了。

一月四日

本文寫完以後，忽覺我在前文「關於中國出路看法」（觀察三卷二十三期）有容易引起誤會的會方，不得已在本文之末追加聲明幾句：即我所謂東歐式幾個民主國家並不是嚴格言之，照類型來說，其實瑞典至少應該在內。所以嚴格分為東與西，是不對的。瑞典最近發表戰後勞動計劃宣言，尤其富有所謂這樣的澈底民主之精神。總之，這些小國頗能利用別國已往的成功或失敗的教訓。中國有其特殊的國情自不待言，但對於利用他國的教訓與經驗一點，却不妨以這些小國為師。這便是我的真意所在。千望樊先生與讀者不可誤會。

乘與戰爭底發動，真如你所想的那樣容易嗎？

如果想找發動或挑動戰爭底機會，在去年一年，尤其是莫斯科外長會議以後底國際政治裏，那真可以說是多至不可勝數。有過戰略上重要地點底攫取，有過干涉鄰國內政底事情，並在互致恐嚇與不敬，訴諸情感與偏見。這一類事，可以說，任何一樁都是引火的東西。有人說過，兩邊都在堆柴，愈堆愈高，高到過頂，以致彼此不能面對面相看。這話一點也不錯。但是依舊沒有人願擦上一根火柴。這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蘇聯不要戰爭，美國政府不要戰爭，雙方都不要戰爭。

這不是說美蘇以外，在歐洲，在其它地方，沒有人在談論戰爭，或害怕戰爭。談論或害怕的，正大有人在。這是一種心情，它的發生有一大部份是屬於

世人底失望：失望大國看法一致竟成了幻想，強權政治一直未離開世界。另一部分則由於一種希望：希望在混亂中討便宜，譬如歐洲有一些反動的站不住腳的政權或分子，便在那裏希望美國留駐歐洲，俾使他們的壽命得以延長。恐懼心所佔底成份也相當高：恐懼一個擁有這樣一個強大的武器如原子彈底國家，由於它的年輕與缺乏經驗，忽然不能自制，想走捷徑以永祚世界。宣傳也是一個原因，它把羣衆底吶喊傳到政治家底耳裏，使他們有時忘記了苦心折衝是他們的正務。而蘇聯在外交上所採用底方法也是一個因素，那便是他們的頑梗，與愛專講一面倒的現實。

情勢真够得上說是緊張，但何以竟沒有緊張到危險的地步？何以從一九四六年八月秋托元帥擊落一架美國飛機之後沒有發生過一樁像是陷入危險境界底事？到快要「交綏」了，何以忽然又持重起來？要爲這個問題找回答，我們應該先了解：在今天，戰爭，尤其是強國間大規模的戰爭，因何而會發動？在從前，連一九一四年在內，戰爭憑偶然發生的事故就會發生。或由於誰在槍靶上失了手，或由於誰的不小心在一個火藥庫裏吸烟。但今日已不復如此。聯合國的存在，以及歷史昭示的戰爭所藏有的可怕的危險，必足以防止任何純因偶然事故而發生的戰爭。戰爭的爆發，其惟一可能，將是因為有某強國須要戰爭。而一個強國須要從事戰爭，在下列兩個理由之中，必居其一：或則有如希特勒之在一九三九年，因為它不相信它可由戰爭達到它的目的，並且相信可以很容易的很快的以戰爭來達到它的目的；或則因為它見到人家在作戰爭底準備，懼怕得厲害，竟促使它在時間還來得及時即先下手。

我們說現在沒有戰爭底危險，是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強國對於戰爭底結果有够強的自信力，也沒有一個強國懼怕和平底後果懼怕到够強的程度。這不是說美國和俄國不是在那裏追逐彼此相反的目的，這是說它們尚在依非戰爭的手段去追逐它們的目的，並且至少在短期內將繼續循非戰爭的路去追逐它們的目的。兩年以來（這拿正常外交的尺度去量）是一段很短的時間，美蘇兩國都希望在德日失敗以後留下來底地盤中分割他們的勢力範圍。這個追逐進行到了去年十二月倫敦外長會議底破裂，算是達到了頂點。在倫敦外長會議上，關於德國問題要達到協議，希望原就不大，但那次的破裂，祇能說又一次證明美蘇的不易協調，不見得因那次的破裂便使美蘇之間的形勢更加嚴重。

在美國，有喧嚷不休的所謂「戰爭販子」，在蘇聯，更上神經高度緊張的盛氣凌人的人物，全在捉摸敵對方的恐懼和野心。這誠然就是所謂「冷戰」。但並無迹象顯示站在這些人後面底政府（實際決策在兩國都只有少數人）在要戰爭。明顯的，它們都寧願採用「其它的方法」，如金錢與物資的使用，以及在思想上拉攏找托幫等等。這些「其它的方法」，彼此之間已正式開始鬥爭了。柴道夫對各國共產黨的指令和馬歇爾援助西歐民主國家的計畫，已在針鋒相對開始作正面的衝突。這一衝突必將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各作各的算計，藉以校量對方，捉弄對方。有不少人特別對蘇聯存備戒心；但現在並無證據足

以說明蘇聯的統治者有心拿武力戰爭去支持其鬥爭，效孤注之一擲。他們對於美國底軍事力量不至於一無所睹，但也不至於懼怕到足以促使他們去冒戰爭底危險。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發動戰爭，結果可能是勝，亦可能是敗。勝敗機會的相等，也許可以不太計較，所慮的是這一戰爭必將是一個長久的艱鉅的戰爭；那正是他們所不敢從事者。因此，俄國底政策，在策略上雖然是進攻的，在目的和口調上却是防禦的。在兩個主要的角逐場裏，即法國和義大利，很明顯的，法義兩國的共產黨現在所採取底新策略，恰恰反映着它們是接受它們尚不能當權這一事實的。至於美國，若有人以爲它循它現行的政策去行事，不特有意外激變即會引起宣戰，那只是暴露他對美國認識不足——雖然美國近來的一「軍國」趨勢，確易使人發生上述這種膚淺的看法。

以上只是說明美蘇之開目今尚無戰爭底危險。但推遲一點看，又如何？悲觀論者，即持「兩個世界」之說者，可折回來辯說道：戰爭在兩個企求稱霸世界者之間終是不可避免的。這有兩點理由。第一，俄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和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不能並存；第二，蘇聯的向外擴展必將和英美的利益，無論在歐洲、在中東、乃至在遠東，發生直接衝突。不錯，對於長期和平過分樂觀，不免招致惡毒之譏。而且人類一向便未做到過維持和平到相當長的歲月。現有的證據也沒有能告訴我們今日這一代智慧比從前高過多少，環境比從前好過多少，必能將前人之失敗變爲成功。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從來沒有一次戰爭真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所談論底這一個尤其缺少不可避免的根據。在歐洲或在世界任何一處，並無不折不扣的美國主義和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同時在生長。兩者之間會有不少稀奇的各種各樣的妥協將它們分隔開來。西方物質上的重配備和技術上的加進步多半要比東方爲快，因此物質上的吸引力與優越仍將屬諸西方。

儘管劇烈的利害衝突，思想的、經濟的、政治的、乃至領土的，必將繼續存在，我以爲武力戰爭，就是推遲一點看，也不會爆發，除非俄國的統治者（因為美國先取攻勢的可能性似乎很小）硬要發動戰爭；那是說，要等到他們或以爲很快的便能取勝，或竟懼怕傷了，懼怕到接近於他們的宣傳人員所誇張底程度。英美，尤其是美國，如有高明的政治家，他們應當知道對付莫斯科最好的辦法是叫它不要過分自信，以至引起僥倖一逞之心，也不要讓它過分害怕，以至於挺而走險；後者尤其重要。高明的政治家應該不放棄任何機會向世人宣告，並以事實表現：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和蘇聯得到協議，彼此共存，而絕無毀滅蘇聯之意。

前一响，美國的不讓步態度，處處表示其決心之強，似乎有點渲染得過分。愛護世界和平的人心深居在克林姆宮底俄國人挾着他們原有的人一套思想，再加上他們對於他國之不求了解，心懷疑慮，會發生真正的懼怕心，以爲美國在政策上表現那樣躊躇滿志，蘇聯已受到壓制了。近日美國內部情形漸趨複雜，各方對馬歇爾計畫的烘托似乎也在降低其程度。這正是頭腦冷靜一點底時

候，緊張的局勢可望和緩下來。兵家用兵切忌窮追，在外交上也忌窮追，尤其遇到這個被迫的是一位俄國人。英美政治家似乎尚喻此旨；我看武力戰爭，就是推遠一點，也是不會爆發的。

世界如有災難，我們決無便宜可沾。反之，可能要遭「滅頂」之禍。願好談「兩個世界」者亦反省反省我們自己的已成了什麼「世界」！

歐洲與美援

馬歇爾計劃的真面目

Victor Perlo
David Ramsey

本文刊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出版之新共和國誌 (The New Republic)。作者 Victor Perlo 及 David Ramsey 均係美國著名經濟專家；前者歷任政府機關如美國國庫局戰時生產局、物價管制局、商務部等的經濟顧問。王作民譯于哥倫比亞

(一)

去年九月，歐洲十六個國家，響應馬歇爾國務卿的建議，草擬了一個歐洲合作復興計劃，交給美國。擬定計劃者是歐洲十六國合組成的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 (Committee of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歐洲經委會)。這計劃要求美國除了繼續緊急救濟以外，更輸送大量的原料及工業設置到歐洲去。歐洲經委會的目標，簡單地說，是想使西歐的生產激增，生活水準恢復到與戰前差不多，國際貿易能達到平衡。草案的主要點，可列舉如下：

擴展工業，穩健地發展國際貿易
全歐洲經濟合作
德國的復興應與全歐的復興相適應
執行本計劃者乃歐洲自己，美國可從旁建議。

三個月後，杜魯門總統以美國官方的馬歇爾計劃草案送交國會，這計劃，正式的名字是「歐洲復興計劃」，現在正在國會裏討論，尚未通過。仔細研究這官方的計劃之後，發現它與歐洲經委會所提出的，本質上已經不同。它的主旨是如何擴大美國的勢力範圍，並非如何幫助歐洲共同努力自給自足。它的要點也可列如下：

並不針對如何發展工業，穩定貿易諸問題
並不鼓勵歐洲經濟復興
德國的經濟利益為首，西歐其他國家的反而為次
使西歐內部經濟機構在在受美國控制

英法及西歐大多數國家眼前的經濟問題，倒不是修復戰爭中損壞的工廠問題；因為這些工廠，縱有損傷，根基仍在。在有些國家，基本工業或者仍與戰前一樣，或是早已更加擴大。歐洲眼前真正的問題，是一個如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幾十年來歐洲首次遭到的難題。戰前英、法、荷、比等國所以生活水準有那麼高，海外投資有絕大關係。可是現在這項來源大部已斷絕了。縱使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法國人在安南，英國人在中東仍在作種種努力，但想恢復戰前情形，是不可能的。

因此西歐諸國，如要穩定經濟，提高生活水準，必須另尋出路。出路呢？是怎樣提高工業效率，提高生產量，同時將產品到世界各市場推銷。歐洲經委會的報告，是很注意以上各點的。因此該會提出請求美國供給西歐大量的鋼及工業設置，理想的目標就是要提高生產，使電量供給超出戰前三分之二，鋼百分之二十，鍊油百分之一百五十。

官方馬歇爾計劃，口頭上是承認這些要點的。尤以杜魯門總統的演講，圓轉週到。可是研究一下推行時的細節，就可以了解，歐洲這種復興的目標，早已大大被改頭換面了。從總統給國會的報告，各種官方及非官方的報告與文件上，我們知道美國著重的問題是運送煤和糧食到歐洲去，並不是怎樣去發展一個豐裕自主的歐洲經濟。

參議員塔夫特一向反對任何發展歐洲工業的大規模援助。杜威市長更暗示說，假如歐洲需要工業，那麼美國就該鼓勵廠家到歐洲去設分廠。至於整個國會的態度，最近召開的特別國會，屢次發表的文告就很可代表。國會竭力主張援助的範圍，應嚴格限於必需品。塔夫特及若干和他

意見相似的國會領袖，恐怕要以一切手段，使馬歇爾計劃中的一點兒「復興」部份，都不能立足——政府當局呢，在這問題上大約要爭一下。

從馬歇爾計劃中的詳細綱領上，美國的態度便可了然。給國會的報告上對西歐各國的原來的草案，大加批評，說：「關於解決住屋，擴充工業，公用事業及一般的復興事業方面，這草案都太誇大。」國務院聲稱：「因為歐洲高度的資本集中，使人民更形節約，因而出口貿易難以發達，這也是目前通貨膨脹的一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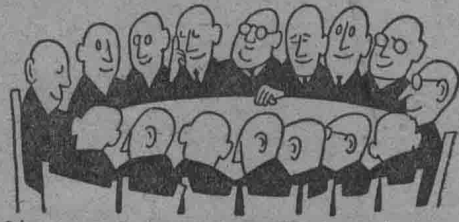
但是自從戰後，資本的集中尚未達到足以修復戰時破壞的程度。更談不到工業的擴充。至於出口困難，通貨膨脹等現象，與其說是因為投資過多，還不如說是因為若干基本原料的不足。

為了自身的復興，西歐各國能夠，而且也必得，集中一些資金，數目至少得相當於歐洲經委會所草擬的生產計劃中的全部生產之百分之二十。這樣一個目標，絲毫也不誇大，只要以最起碼的國內經濟控制就可達成。

戰爭期間，限制更嚴格的時期，大多數參戰國的投資，達到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蘇聯曾經在比現在的西歐更艱難的情況下，完成她的建國計劃。

杜魯門總統將這削減西歐投資的理論應用到他的物資供應程序裏去了，使歐洲經委會原來的草案失去了鰲的。原草案中申請的粗鋼，美國祇答應給三分之一，所要求的廢鐵，全未提起。至於鋼鐵工廠及製造農業工具等等設備，原來的請求至少被打了对折。原草案要求美國進口貨中百分之三十三屬於再生產物及生產鋼的原料和機器，但杜魯門總統提交國會討論的馬歇爾計劃裏，這項已減到百分之十四，而且這百分之十四裏同時包括國際銀行的輸出。要知道，國際銀行是另一回事，原來並不是歐洲復興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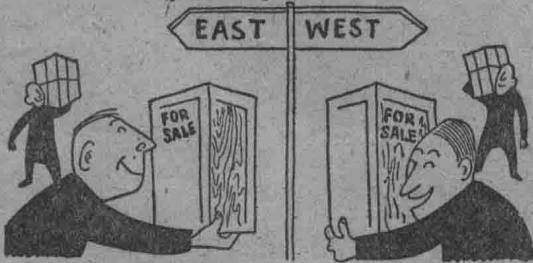
馬歇爾計劃有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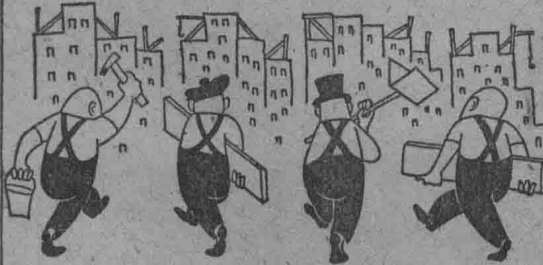
第一個：十六個歐洲國家組成的歐洲經濟復興委員會草擬的方案



歐洲經委會要求歐洲能依仗自己的工業而獨立



歐洲經委會要求歐洲各國互相通商



歐洲經委會要求各國共同努力從事復興



歐洲各國要求參與國合作解決經濟方案



第二個：杜魯門總統送交國會的
美國官方馬歇爾計劃



美國要他們不斷地哀求施捨



美國的反共政策阻擋了彼此的貿易



美國要先把德國喂肥



美國要操縱一切

劃裏的主要部份。

由鋼的輸出問題上，可以看出美國是如何不顧幫助歐洲恢復對外貿易。歐洲經委會力請美國供給粗鋼及廢鐵，那樣，歐洲每年就能出口三百萬噸的熟鋼（所謂粗鋼及廢鐵僅及美國在戰前該項輸出之半）。假使美國答應這個請求，西歐就可從鋼的出口中每年收進五萬萬美元，同時還可以收回與鋼有關的貨物的市場。

但是杜魯門批駁了這請求，減低生產鋼的原料與物資的供應，說是因為美國自己也缺貨。實際上，歐洲經委會所要求的不到美國全部鋼的生產的百分之五。如果美國國內能有一個公允的配給制度，提出百分之五，並不發生嚴重影響。政府的自相矛盾更可從熟鋼的供應上看出來。政府要給歐洲的熟鋼，比歐洲經委會原來的請求多三倍！這辦法是完全符合美國鋼鐵企業公司的利益的。戰前英、德、比的鋼鐵市場，現在全被美國接收了。不但如此，他正利市三倍，財源興旺，向國外買主要價比國內價格高出二倍甚至三倍！

馬歇爾計劃的精神，從頭到尾，是減少對歐洲再生產原料的供應，削減歐洲的市場，以符合美國大企業的利益與方便。美國老百姓方面是要犧牲一點的：消費要減少，物價要增高，可是企業家却不損毫毫，不丟掉任何一個國際市場，也不失去任何一個投資的機會。

更厲害的是，馬歇爾計劃還沒通過，英法已被逼縮小他們的投資計劃了，尤其是住屋建築的投資。因為要按照預定，提高生活水準。如果西歐各國接受了美國政府的馬歇爾計劃，那麼原來歐洲經委會的計劃就無從實現，談不到發展工業，現代化諸問題。歐洲各國將更依賴救濟以生存，如糧食及燃料的拖捨。提高生活水準這件事將一拖再拖，明擺在馬歇爾計劃裏的事實是，西歐在一九五二年，生活水準還得比戰前低。換句話說，就是歐洲人民心裏明白，身經六年慘戰，三年救濟生活，再加上目睹歐洲復興計劃施行四年之後，自己的日子，還是抵不過一九三八年時那麼舒服。

馬歇爾計劃，除了復興歐洲之外，另一要義，是歐洲的合作。但是如果問題的焦點不集中到東歐與西歐的貿易上去，討論合作是句空話。照現在，最多，歐洲只能像戰前那樣和拉丁美洲、非洲、亞洲通商。如果想增加輸出，支付一個像樣的生活水準，戰後西歐的市場，必得以東歐為主。同時還得依仗東歐的原料供給。

(二)

歐洲經委會很看重東西歐貿易這問題，這幾乎是原草案的主幹，雖然為了不言而喻的原因，實際執行的步驟並未規定下來。還在馬歇爾作哈佛演講之前，向這方面進行的努力早就開始了。同時聯合國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及其他方面，也在加以研究。譬如最近聯合國報告裏提出：如果美國可以將價值五百萬美元的特種製木機器供應東歐，東歐就能輸出木材到西歐，使西歐由進口美國木材項目下，節省每年七千萬美金！

杜魯門當然知道歐洲的願望，在他的演說中，他提到政府的計劃是「根據以下的信心，即在以後五年時間內，使東西歐的貿易能恢復戰前的正常狀態。」可是為了美國與東歐的不能合作，這目的的實現就受到阻礙。不合作是美國的現行外交政策，連馬歇爾計劃本身也不過是這政策的一環而已。

再舉個例，歐洲經委會原來草案中有個假定，假定能買波蘭的煤，就可不必進口美國的昂貴的煤了。最近聯合國的報告也說到，如果美國（只有美國有這能力）供給波蘭價值九千萬美金的採礦與運輸機器，材料，那麼波蘭的煤的產量就可提高到比現在法國的消費量多三倍，比魯爾的消費量多兩倍，這樣，西歐各國可少向美國買煤，每年可省五萬萬美金！

可是這種貸款的希望是小極了。馬歇爾表示計劃之先，東歐的貸款請求已不知若干次被擱不理。即理睬一下，也不知折扣到何程度。近幾個月來，商務部長是哈理曼及其他政府發言人說得更明白了，美國政府是不貸款給「集權政府」的。波蘭還在指望世界銀行的貸款，藉以提提高煤的輸出，不過世界銀行裏的美籍高級官員，未見得會違背了本國的外交政策，批准這種貸款。

杜魯門提到恢復東西歐「正常貿易」，可說是針對現在歐美批評而出的。各處對馬歇爾計劃阻礙了歐洲內部的通商，已嘖有煩言。但是東歐呢，對這種「正常」的恢復必定要反對的。戰前，東西歐的經濟關係是：西歐控制東歐的經濟，東歐將原料出口到西歐，可是同時西歐不將工業化的物資供給東歐。

無疑地，波蘭及巴爾幹各國反對接受這樣的「正常貿易」。會堅持要擴充本身的工業，提高本國的生活水準。真正的歐洲合作，其主要精神，應同時以東歐西歐的利益為重，使雙方站在平等地位通商貿易。

(三)

一切恢復德國經濟支配地位的努力，特別像希特勒時

代那樣的支配權，必遭受東歐的強有力的抵制。西歐別的國家所担心的問題，就是如果德國得到優先機會，從事復興，那麼這受支配的恐怕不是東歐，而是他們自己了。

這種憂慮，由歐洲經委會的報告裏在反映出來。因此草案提出德國的復興應與西歐其他國家的復興相適應。草案並促使將魯爾區的煤運到法國及其他國家，以便發展法國等地的鋼鐵工業。歐洲經委會語氣沉重地說：「德國的經濟發展，『如果危害了歐洲別的國家，像過去那樣』，就有加以阻止的必要。它還說：『德國有義務……賠償戰時損失，並協助犧牲在她的侵略下的國家，從事復興』」。

美國要讓德國首先復興這件事，雖經官方一再否認，——最近，杜魯門也否認過——可是仍不免由國會及政府的文告，以及最近提出的對德協助案裏顯露出真面目來。主張「德國第一」的如前總統胡佛，美國機械大企業約翰曼維公司（John-Manville Corp.）的老闆路易勃朗（Lewis H. Brown），他們的理論正是現在政府所忠實遵循的。去年十二月九號陸軍部長勞易爾對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說：「我們不但要使西歐經濟自給，還要使她工業潛在生產力能成為歐洲復興的奠基石。」

為馬歇爾計劃辯護的人，都認為西歐的繁榮是建立在德國的經濟上的。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過去德國激烈的競爭，使英法在世界市場上失色。而德國與西歐諸國的通商呢，一九三八年，對德國的輸出只佔英國全部出口百分之四，佔法國全部出口百分之六。西歐的小國與德國通商數量較大，但是大多數仍舊不免同時在國際市場上與德國競爭。

歐洲經委會草案中，說明要以美國援助中百分之十五予德國，比德國分得多的國家，只有英法兩國。即使這樣，哈理曼委員會（譯著：總統的經濟研究委員會）即不滿意，批評說：「德國應該接受比巴黎決定的更多的救濟」。最近美國佔領區軍政府一個官員在他的報告上提到馬歇爾計劃，估計西歐可獲四十四萬萬美金以上的救濟。那樣要佔杜魯門給國會討論的計劃的全部費用之百分之二十七。德國更可以得到不少間接援助，如軍費的支出，剩餘物資等等。救濟目標已由西歐其他國家轉到西部德國，近來更看出對英援助有銳減的象徵，很可能將來德國所得要比其他一切國家為多。

西歐國家除了救濟物資少得以外，還要犧牲德國的賠償。這些國家，原指望可獲取一筆賠償，從事復興建設的。可是直到現在，所得尚是微不足道。馬歇爾在倫敦

外長會議上根本否定了賠償計劃，對於這些原想從西部德國取得賠償百分之七十五的國家，真是當頭一棒。原來想以德國原料為賠償的辦法，迄今仍是一紙空文。現下國會壓力漸漸增高，想根本取消這種打算。從馬歇爾在倫敦的立場來看，這是一個自然而又合理的結果。

華盛頓的舉動，好像要西歐諸國反過來賠償德國了。歐洲經委會草案上要求美國供給運貨卡車十萬三千輛，若干國家，車子被納粹劫持，迄今尚留在英美佔領區內。這些國家應分得九萬輛美國救濟的車子。可是馬歇爾計劃，通過駐德軍政府，要求西歐諸國如要求歸還納粹劫持的車輛，便須以自己奪得的德國車輛來交換。歐洲經委會所請求的數目已被減低到二萬六千輛了，這些又完全指定給西部德國！

西部德國主要的貢獻，以歐洲而論，應當是把魯爾的煤輸出到法、意、荷，讓這三國的鋼鐵及其他工業增長起來。戰前德國每年約出口煤二千五百萬噸，目前的魯爾出口量，以年算，約合一千萬噸一年。英美軍政府表示到一九五二年，大約可希望增加出口到二千四百三十萬噸。不過報上却盛傳在德國黑市上買賣的煤有二千萬噸，如報上的報導沒有錯，那麼現在德國就可以每年輸出三千萬噸。軍政府計劃使德國煤的生產，全部恢復。但鋼的生產只恢復到戰前的百分之五十。照路易勃朗軍政府作的報告說法，也許到十年之後，才能達到這鋼的生產目標。他的估計要是對的話，那麼魯爾每年剩餘的煤該達五千萬噸，比英美軍政府眼前想到的目標要高兩倍。

可是，照勃朗的說法，全部德國的煤都不出口，以便把德國重建成一歐洲一個偉大的洗心換面的國家。眼看這種「德國第一」的政策更逐漸露骨了。美國現在已答應負擔佔領區的全部開支，交換的條件，是對經濟問題有更大的權力。像這樣，美國就「買」到了對德經濟委員會的操縱權，將進一步支配整個西德的經濟機構。種種事實，證明美國政策的動向，縱然當局再三否認馬歇爾計劃主要

的目標是重建西德，將德國戰前在歐洲的經濟支配地位恢復光大。而鐵一般的事實，却是這否認的最有力的反駁。

(四)

照原來馬歇爾的說法，這計劃本來百分之百是歐洲的事，美國不過以同情的態度，從旁加以協助，連計劃的起草，都絕對避免干預的。當時，若干人士，還相信也許美國政策有了變更，因為這種現象不同於杜魯門主義，更不同於貸款與英、法、義時所附帶的種種嚴酷的條款。可是仁慈的表示很快就接觸到政策的現實。美國的眾議員們公開干預了十六國參與的巴黎會議，以至使歐洲經委會非澈底重寫報告不可。原先想要二百九十億美元金(\$29 billion)，後來縮到一百二十億(\$12 billion)，更添上一個全套的「附帶條件」，這些條件根本牽連到參與國的國內經濟機構。

還不止此，跟着大企業公司也提出建議來了，隨着國會議員又到歐洲去遊歷起來了，政府裏各式委員會也提出意見來了。種種嚴厲的條款，包含在臨時緊急貸款裏的頗多，可是附在官方馬歇爾計劃裏的更多。像這樣厲害的外來的經濟干預，除了在戰勝國佔領戰敗國時見到過以外，歐洲可以說是前所未見，前所未聞。國會裏提出的經濟合作案中幾個主要的管制可分析如下：

歐洲復興計劃的執行者，不是十六個參與國組織的團體。每個參與國與美國單獨締約，由美國設一執行人，締約國的每一項出口，每一項計劃，均由此人批准，因此美國控制了大部份歐洲對外的貿易。

計劃中主要部份，如糧食、燃料、肥料等輸出，應算作美國的贈與。接受這贈與的國家，必須以相等於該物資的本國貨幣存入銀行。這筆錢該國可以動用，但須經美國同意。如此每一參與國必有大量貨幣，其處置權操在美國。華盛頓由此可影響每一參與國內部經濟機構。

每一參與國，為取得美國援助，在決定穩定通貨、匯率、關稅，控制對外貿易等問題上，必以美國原則為主。

由過去美國與他國交涉的經驗，更由國際貿易會議美國所持立場上，均可看出美國全副精神均用在如何阻擋基本工業國家化這問題上，同時，他也努力打破各國限制奢侈品輸入的辦法。

計劃執行人得動用計劃中的金錢，來擴大某種稀有軍用原料的生產。如果執行人對此堅持，參與國是難以反對的。當然美國會以代價購買這種原料，不過美國這種操縱力量，可以侵入歐洲某些大企業組合的勢力範圍，——如錫和橡皮——進而使美國可以壟斷世界上稀有的軍用原料。每一參與國內，須設置「經濟合作主管」，常駐該國，督導計劃中「特殊的任務」。恰巧，國務院同時指出：在希臘，因為美國援助機關已經建立了，就可不必另設主管。

像這種種種權利，結果使歐洲會門戶洞開，讓美國銀行界可以大大投資設廠。提交國會通過的經濟合作方案中對這種種辦法，特加保證，十四年內花在這方面的費用，規定為八萬萬到八萬五千萬美金。是全部計劃中的百分之五。比這要緊的是，這樣的經濟控制，本身就是對美國大企業的一個保證，因為有了控制，就能破壞歐洲工業國家化的計劃，並可保證美國所有的利潤可自由運回本國。

美國的大企業由此就能通行無阻。譬如煤油企業，就可詳細計劃，如何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控制西歐主要經濟命脈。辦法澈底行之之後，那麼歐洲的地位，就好比現在到五十抵價外資的利潤。這樣的支出，無疑將使西歐的生活水準繼續低落，同時將使西歐日益失去經濟自主權。

掌握着馬歇爾計劃的是美國，凡是參與國不遵守執行人（實際就是國務院）的原則時，美國就可停止這計劃。杜魯門對國會的報告裏說得很明白：「它（馬歇爾計劃）代表我國外交政策主要的一環，它將每天影響我們外交政策的決定，同時受政策決定的影響」；在這樣以經濟干預為外交政策的手段下，西歐還能獨立到什麼程度呢？

甘地之死

(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這是人類的最大悲劇：一生宣揚和實踐非暴力的聖雄甘地却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卅日傍晚的新禧大會上，以七十九歲的高齡被人槍擊，死在暴力的手裏。

那天傍晚，太陽落下的時候，人們從電台的廣播裏知道了這消息，新德里的電影院和劇場立即停止演出，商店和餐廳紛紛關門，正在進行的結婚典禮也宣告延期。人

們的感情突然變成了真空。夜裏八點半鐘，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副總理巴特爾向全國發表廣播，尼赫魯一開始就泣不成聲的說：「我們生命裏的明燈已經熄滅了，到處都只有

着黑暗。……我們將不再跑到他那裏去聽取忠告，將不再從他那裏得到安慰了。」

三十一日上午，新德里印度門的廣場上擁擠着千萬羣衆，等着對他們的國父甘地的遺體作最後一次的景仰。柩車上，甘地的身體被印度三色國旗掩覆着，國旗上面堆聚着重重的玫瑰花。他的面孔依舊是那麽肅穆虔誠，顯示出他對人類的大愛和他爲人類贖罪的犧牲所換來的寧靜。尼赫魯和巴特爾則坐在他身旁，尼赫魯紅腫的眼睛裏還含着淚水，巴特爾則整個變成了一座悲哀的塑像。記得去年八月十五日，我也曾在這塊廣場上，看着印度自由的旗幟在千萬羣衆的狂歡裏升起。六個月後的今天，羣衆中沒有一個人再敢追憶當時的心情。

當天傍晚，在舊德里的朱姆那聖河岸邊，依照着印度教的儀式，一堆檀香木焚化了甘地的遺體。他的骨灰已經收檢，定於二月十二日在阿拉哈巴附近投入朱姆那河與恆河的匯流處。從此，每天黃昏，人們將不再聽到他在祈禱會上約和平的聲音了。比拉大廈後面，他被刺倒下的那塊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了頂禮膜拜的聖地，而且地面已經被羣衆們挖了一個坑，因爲很多人都想得到那裏的一撮土當作神聖的紀念物。他住過的那間房子也已開放，房間裏跟他生前一樣，除了一個坐墊之外，甚麼傢具也沒有，現在那坐墊上只有他的一張照片，旁邊擺着他的手紡車，還有他最近剛好收到的一頂緬甸農民帽子。

對於甘地，死只是他的一個朋友，只是他必須要跨過的一道門檻。他的身軀對於他的靈魂的價值是那麼渺小，即使他事先知道當天他會被謀殺，他也一定會帶着笑向那兇手走去。實際上，他一月十八日剛好停止了最後一次絕食，二十日的祈禱會上就曾有一顆炸彈在他身旁爆炸，他當時一點不動聲色，第二天在新禱會上勸大家同情那被捕的暴徒，要讓他有改過自新的機會。警察當局根據那暴徒的口供，曾向甘地提出警告，說他的生命有着危險，但甘地却拒絕武裝保護，也拒絕接近他的人被警察搜查。他不願意在他自己與羣衆之間建立起任何人的阻隔。幾十年來，他天天跟人民大眾在一起，從來不曾有過武裝保護，要謀殺他也就跟謀殺任何一個印度農民那樣容易。但一直到一月三十日傍晚，才發生了這惡夢裏也不會出現的慘劇。當他中了三槍倒下時，他只接連的叫着：「上帝，上帝！」

他在一月十八日停止絕食後，還曾樂觀的表示希望他能活到一百二十五歲。被刺之前，他還曾爲「哈里真」週刊寫了最後的一篇文字，希望國民大會黨在獲得了政治自

由之後，要繼續努力，爭取社會經濟的自由，並且主張清除大黨中的腐敗份子，多多吸收來自農村的新力量。他在那篇文章的末尾說：「這裏我只把一片遠景顯示給你們。假若我的時間和健康允許，我希望再詳細討論人們的公僕應該怎樣服務，以便在他們的主人的估價中提高他們的地位。」被刺的前一天下午，一位難民代表曾憤怒的請求他到喜馬拉雅山休養去，但他却不願享受山中的和平，願意活在民衆當中，在週圍的混亂裏能夠採取多少和平就採取多少和平。他的存在就像一件完美的藝術作品，因爲絕大多數的人覺得它是一種激勵，也就有一部份人覺得它是一種阻礙。他的死，尤其是像現在這樣的死法，把他幾十年來潛藏在人們心底的影響都給顯露出來了。

他是印度的「大靈魂」，他的王國是建築在人民心裏的，他的城堡是真理，他的武器是愛而非暴力。他搖着紡車，大聲的思想，用他的愛去洗滌人類社會的罪惡，用非暴力去扭轉時代思潮的逆流。他的生命史也就是印度的現代復興史。因爲他也是一個人，他走過的道路也是常人走過的道路。當他最初到英國去讀書時，也曾西裝革履，學過跳舞，學過提琴，只想變成一位十足的紳士，但最終終於放棄了這些虛妄的想頭，把生活方式完全改變，從經驗中慢慢的探索到了真理。在南非洲，他的膚色給他招來許多親自的屈辱，思想上朦朧的概念凝定了，他開始應用他的武器從事鬥爭。他以大無畏的勇氣，一面向南非的種族主義，英國的帝國主義挑戰，一面消除印度內部的階級偏見和教族仇恨。他絕食、坐監、非暴力抵抗、不合作、摒棄一切官能的享樂，淳樸而執着的相信真理，實踐真理。印度的劃分便他有着直覺的恐懼，他雖然難於挽救這不可避免的安排，但他却站立在幸福與災禍的線際間，用自己的犧牲去說服他的國人。教族間的屠殺警告他不要再徒然的呼號教族和諧，不要再去玩火，但他最後一次絕食的目的就是爲了促成教族和諧，他相信他是在救火。終於，救火的人喪身了。他是一個印度教徒，殺死他的也是一個印度教徒。蘇伯納得到他的死訊後，只說了一句話：「這證明人太好了是多麼危險。」人類的聖哲並不是每一代都有，而且，歷史上雖然閃耀着不少光芒的名字，但每一個名字差不多都代表着一個埋葬了的美夢。在歷史家的筆下，在後代人的記憶裏，「遺臭萬年」的人跟「流芳百世」的人也同樣的佔據着一席之地。

甘地是托爾斯泰的崇拜者。托爾斯泰的教訓連他自己的妻子和兒女也難於諒解，結果到了暮年，還不得不夜間出走，寂寞而失望的死去。甘地哩，好像是上帝的意旨要

他領導印度得到獨立，他的環境比托爾斯泰幸運，他的教訓在羣衆中產生的影響比托爾斯泰大。（也許可以說，托爾斯泰主要的是以他的著作來服務人類，（因爲他在晚年的日記裏，曾經冷酷的拷問過自己：托爾斯泰啊，你是照着你自己的教訓生活的嗎？回答自己：不，我慚愧得要死。）而甘地的教訓跟他的生活實踐則是完全一致的，他把他的整體毫無保留的捐獻於爲印度以及爲全人類的服役裏。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印度十萬個鄉村裏億萬農民的生活方式，但他的思想方式却跟托爾斯泰的思想方式一樣，是二十世紀的文明教化所不能全部接納的。他的死，全世界各地都獻來「花圈」，但「花圈」獻過以後呢？

甘地自己曾經說過：「甘地可能死去，但甘地主義將永遠活着。」一位美國記者費契爾一個多月前才在德里出版了一本書，叫作「甘地與史達林」。主要的課題是，今天的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必須決心在兩條路之間選擇一條：一條是暴力與獨裁的路，他稱爲史達林的路；另一條是非暴力與民主的路，也就是甘地的路。向甘地獻「花圈」的各國領袖們應該想到，任何形式的戰爭當然都不是「非暴力」的。

就印度自身來說，甘地的死，在料想中會生出兩種反應！一種是純粹的悲哀所激起的憤怒，對謀刺的兇手及其同黨實行報復；另一種是高度的悲傷淨化成了堅強的力量，用這力量去完成甘地生前不能實現或者實現得不夠徹底的工作。甘地死後的兩天內，孟買、加爾各答、浦那、甚至德里等地的羣衆，因爲謀刺的兇手屬於印度教大會，又因爲 R.S.V. 組織（註）曾於甘地被刺那天傍晚在街頭散發糖菓給兒童表示慶祝，因而襲擊這兩個組織的領袖住宅和機關所在地，搞毀跟這兩個組織有關的報館，這可以說是第一種反響的表現。證明第二種反響的是尼赫魯和巴特爾接連的發表聲明，表示政府決心遵從甘地的遺訓，對鼓吹教族仇恨的組織和私有軍隊決不加以容忍。現在 R.S.V. 的集會已經下令禁止，印度教大會的一位領袖已經被捕，德里也已調來了強大的軍隊，準備防止任何暴亂發生。同時，印度九省的省督正在新德里跟中央政府舉行會議，商討維持全印度各地治安的問題。

尼赫魯是甘地自己指定過的繼承人，現在全印度的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只有他能夠實際掌握印度的運命。假若印度人以後不僅對國父遺像作形式上的虔敬，假若甘地夢想中的印度能用一死的代價換來，那他的死將是一個絕大的勝利。

(註：R.S.S.——Rashtriya Swyam Sevak Sangh 是一個純粹的教族組織，以保衛印度教，復興印度教文化和團結印度教徒為號召，實

甘地與新印度

(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甘地的第十五次絕食從一月十三日上午開始，已於十八日中午結束。他第一次絕食是一九一三年在南非，第十四次則是去年九月在加爾各答。歷次絕食的原因，不外提高印度教民階級的地位，促進印回兩教的團結，以及反抗當時英國的統治。其中也許要算一九四三年那一次的影響最大，那次絕食是為了提出「退出印度」的口號而被捕，監禁在加爾各答，結果他二十一天的絕食，動搖了英國統治印度的基礎。他為了印回團結問題先後曾絕食三次：最早一次是一九二四年，地點也在德里，當時他曾宣佈，假若他的死能夠換來印度教徒跟回教徒的和睦，他一定樂意死去。最後是阿沙德多方努力，舉行了一個印回團結會議，調解兩大教族的衝突，他的二十一天的絕食也才宣告停止。去年九月，當加爾各答暴動最厲害的時候，他曾不顧生命的危險，親自在暴動區域以內，三天的絕食竟壓住了瘋狂的屠殺，造成一個空前奇蹟。現在這一次絕食沒有限期，一直要到德里的各教族間，不藉任何外來壓力，純粹由良心的醒覺而彼此和諧相處，真正結團時，絕食才會停止。

甘地這次為甚麼絕食呢？去年加城絕食後，他帶著還沒有完全復元的身體來到新德里，並且計劃到巴基斯坦去，但他在這古老而寧靜的京都也嗅到血腥味，他的直覺叫他在德里住了下來。在這段期間裏，他每天聽到的和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被屠殺，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和錫克教難民對於德里回教徒的報復行為。他也看見這些失去了一切親人和財產的難民們沒有足夠的安身之所，沒有足夠的遮身衣服，在大雨裏睡覺，在冷風裏發抖。仇恨與生活使得他們「接收」了回教徒空下的住宅，就是回教徒還佔據着的房子，他們有時也會把主人趕走，甚至搬到回教寺院裏面去住。難民們和回教徒們每天都跑到他那裏去哭訴他們各自的遭遇，但他們都同樣的要求讓他們能夠活下去，像一個自由國度的自由人民似的活下去。同時，克什米爾土邦的糾紛已經越過了直接協

實際上想把所有的回教徒趕出印度，把印度建立成一個印度教國家。該組織的態度比印度教大會更趨極端，更崇尚暴力。據說不久以前，在該組織的一次

商階段而提到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顯然已變得表面化，兩個自治領都有着不少的人在嚷着戰爭的不可避免。甚至在他宣佈絕食的前兩天，巴基斯坦首都卡拉蚩和西旁遮普省的匹拉特兩地發生慘劇，死了不少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位七十九歲的印度國父心裏會有如何的感受呢？他為了印度的自由獨立，幾十年如一日的堅苦鬥爭，現在獨立雖然實現了，却是在另一種形式之下實現的，他的夢想已經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更不料這獨立帶來的是自相殘殺，靈魂墮落，古老的文化變成了原始的野蠻。他在高喊「退出印度」的口號時雖然不幸言中，英國人的撤退也許會引起暫時的混亂，但他想不到，也不相信混亂的局面竟會有不能收拾的趨勢。他很遺憾不曾阻止到印回兩教在結婚以前的離婚，他卻還夢想着終久會有一個大同圓。他處信非暴力，他有着滿腔熱愛，但他是一個沒有武器的戰士，當他「內心的聲音」告訴他甚麼時候應該絕食，他便決定絕食。他在宣佈絕食的談話中說：「對於那些每天都來看我，問我們應該怎麼辦的回教友人們，我無法答覆他們。我的無能近來常常咬噬着我的心。……假若一個人是純潔的話，他可以給予的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他的生命，他希望而且祈禱我有着那種純潔來辯護我的行為。……因此，我請求每一個人冷靜的檢討我絕食的目的，假若我非死不可的話，就讓我安靜的死去。我與我的活着無能為力的看到印度、印度教、錫克教、以及伊斯蘭教的毀滅，死對於我倒是一種光榮的解脫。假如巴基斯坦對少數民族不保證平等的地位和生命的安全而印度又仿效着巴基斯坦去做，這種毀滅是一定會到來的。」他這次絕食期間發表的談話中，曾經好幾次提到死的不可避免和他自己的無能。他這種慘淡幽憤的心情，也許從西孟加拉省省督拉加哥帕拉查理的一篇聲明中更可以清楚的瞭解。拉氏是甘地多年的朋友，年紀也比甘地小不了幾歲，他曾於甘地絕食的第二天在加爾各答說：「在目前，神智清醒的只有甘地傑一個人。其他的人不是整個的錯誤就是局部的錯誤……我們已經親

眼看見了許多空前的殘酷和暴力。當開明的人們都變得麻木不仁時，像甘地傑這樣的人會感覺生命沒有目的。假若我們不能阻止像我們已經歷過的這些荒唐行為，我們還有甚麼理由繼續的活下去呢？甘地傑在聲明中說，沒有一個朋友像死亡一樣，那並不是矯飾的說法，因為死亡把我們救出一切的糾紛和痛苦。」

甘地絕食期間，德里和全印各大城市都舉行羣衆大會，祈禱大會，領袖們出動呼籲教族和平，德里街頭更每天都有壯烈的和平遊行。甘地自己接連的說，大家的努力不應該是救他的命，而應該是救印度和印度的光榮。國大黨主席普拉沙在絕食的第一天發表聲明，呼籲建立起各教族間的親善與和諧，他說在英國統治時代，甘地曾經絕食了很多次，但都平安的活了過來，假若現在自己人不能救他的性命，那將是每一個印度人，特別是每一個國大黨員的最大恥辱。反對這次絕食的只有少數難民。十四日傍晚，有一部份難民跑到甘地住着的比拉大廈門前示威，大聲叫喊着「讓甘地死吧！」的口號。一位錫克教難民在對新聞記者陳訴他的悲慘遭遇之後，憤慨的說：「想為了保護回教徒而死的人是不配活着的。」另一位難民却表示意見說：「政府為甚麼不宣佈一項計劃，在德里建築四萬間房子給難民住呢？要解決教族問題，這樣的計劃比絕食有效得多。」十七日傍晚祈禱大會之後，德里民衆四千多人的和平行列正從甘地的床邊繞過，恰好一批難民又和平行列的人，前喊着反甘地的口號。這激怒了那些參加和平行列的人，假若沒有警察干涉，也許在甘地為和平絕食的床邊就會發生意外的不幸。因為難民們的經歷裏只有仇恨和憤怒，他們難於瞭解甘地的大愛和深心，以為甘地的絕食是在袒護回教徒。

這次絕食的影響不能說不大。印度總理尼赫魯，副總理巴特爾，教育部長阿沙德等兩次跟甘地舉行長時間的密談之後，十六日便正式宣佈了兩項重要的決定。一項是尼赫魯親自率衆大會上對難民們保證，現在沒有住處的人將在一個禮拜之內得到安身的地方。政府並且已在德里附

秘密會議中，有一位領袖曾說過，他們決心要建立起印度斯坦，而且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對付阻礙他們的任何個人或政府。該組織秘密的擁有武器，並且有所謂敢死隊。二月三日新德里

近劃出了一塊廣大的區域，為難民們修建房屋。現在在德里難民共有四十萬左右。第二項是印度政府決定立即實施與巴基斯坦訂立的財政協議，將五百萬盾盧比的現金付與巴基斯坦。記得巴特爾在宣佈財政協議的條款時，曾經明白的說過，希望巴基斯坦把這協議看作印度的親善表示。他又說明，協議的圓滿實現要靠雙方繼續保持著寬大和妥協的精神。換句話說，那就是要克什米爾問題有了好轉，巴基斯坦不再對侵略者予以支持。但實際上，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侵略者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而且問題越鬧越複雜，弄到提交安全理事會去解決。於是印度政府決定五百萬盾盧比的現金暫停付款，因為這筆錢的用途顯然會對印度自身不利，那等於把手槍借給一個準備謀害自己的人。但是為了甘地的絕食，印度政府竭盡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便建立起親善與和諧，使甘地早日停止絕食。經過尼赫魯等跟甘地商量之後，才作了這樣的決定。甘地對於這決定非常愉快，當天傍晚，他在對新聞大會的書面談話中說：「任何責任內閣改變其既定政策，決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但我們的責任內閣卻以同樣的審慎和敏捷變更了它的既定政策，這是值得全國衷心感謝的。……但促成這種決定的是甚麼呢？是我的絕食。沒有我的絕食，他們是不會超過法律允許他們所需要他們的範圍的。」

同時，他希望印度政府這種親善的表示會在巴基斯坦引起反響，使得克什米爾問題兩自治領之間的一切糾紛都得到圓滿解決。在宣佈這項決定的政府公報之外，尼赫魯還發表了一篇聲明，似乎煞費苦心的解釋政府這種決定並不是改變了他的同僚們歷次聲明中一致表示的意見，不過是遵從印度的光榮傳統和甘地的崇高教訓，使世人相信印度是誠摯的希望著和平與親善。至於克什米爾問題，他說印度政府的立場沒有改變，並將實踐其對於克什米爾民衆的諾言，使他們獲得自由。他又在一個羣衆大會上駁斥關於印巴戰爭的流言，但他說，假若有任何緊急事件發生時，印度軍隊的實力是足以應付的。

最近七八個月來，尼赫魯憂慮集於一身，聲音比從前嘶啞，臉上添了許多皺紋，看去至少蒼老了十年。平常他每天都要到甘地那裏去，這次絕食期間，他更是不離左右。第三天以後，甘地身體變得微弱，不能多作談話，他也在甘地身邊默默對坐。據說他也曾暗自絕食，不過沒有讓別人知道。由於他跟阿沙德、普拉沙等人的努力，甘地在十七日提出了他準備停止絕食的條件。於是普拉沙以國大黨主席的身份，跟德里各教派代表連夜舉行會議，全體聯合簽名向甘地保證，絕對做到甘地提出的各項條件。該項保

證於十八日中午在甘地面前宣讀，甘地認為滿意之後，整整五天的絕食便宣告停止了。保證的條件是：回教徒們可以自由的慶祝即將到來的一個宗教集會，非同教徒自動撤出佔用的回教寺院和住宅；回教徒的行動有充分安全保障；不對回教徒經濟絕交；已經離開的回教徒可以自由的回德里等。絕食停止以後，甘地會發表談話，很樂觀的希望他能活到一百二十五歲，希望保證的條件都能夠真正做到，同時，不僅德里要保持和平，其他各地也應該保持和平，印巴關係也應該融治無間。他又宣佈，假若必要時，他是不惜再來一次絕食的。假若德里能讓他走開，他準備到巴基斯坦去。

巴基斯坦方面對於這項絕食也曾表示關切，甘地收到的電報有許多就是從巴基斯坦寄來的。但到目前為止，巴基斯坦還沒有甚麼實際的反響。五百萬盾盧比的問題，他們認為印度在先的扣留是不正當，現在決定發放，似乎是理所當然。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沙弗魯拉曾說，假若甘地想用絕食的方式來促進教族和諧，這事實却不能用對巴基斯坦的一種壓力，叫巴基斯坦去做違反自己良心的事。甘地的看法則以為，要是在印度只有黑夜，在巴基斯坦也就難於找到光明，一切得從印度自身做起。他一向在新禧大會中都要略可離經，曾有少數非同教徒因此在會場搗亂過，請他不要略。以後他真的到了巴基斯坦，跟那些信奉可離經的人住在一起時那將是試驗他的力量的另一個機會。

甘地的第十五次絕食是結束了。有人曾經問過他，他認為這次絕食應該歸咎於誰。甘地說他不歸咎任何個人或任何教族。他相信，假若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一定要把回教徒趕出德里的話，他們將出賣印度和他們自己的信仰，那會使他傷心。他又曾同時提到巴特爾，說有許多回教徒指責巴特爾最近發表的一些談話，因為巴特爾說過，留在印度自治領的回教聯盟的人員是不能一下就變成朋友的。甘地勸告回教徒們不要責備巴特爾，而且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證明巴特爾的說法是不正確。甘地說尼赫魯的作風雖然與巴特爾不同，但尼赫魯却認為巴特爾是一位難得的同僚。假若巴特爾是回教徒的敵人，尼赫魯是可以一請他退休一的。

絕對聽從甘地的意見，因此，國大黨中人都親暱的把他叫作甘地的「Yes Man」。現在不知怎麼的，甘地自己說巴特爾已不再是他的「Yes Man」了。巴特爾自己哩，他於甘地絕食的第二天因事離開了德里，十六日曾在孟買市政府的歡迎大會上致詞。他這篇坦白的演說，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甘地與新印度的關係。他說：「甘地傑的絕食，各方傳說紛紛。事實是，德里雖然有著和平，但甘地傑說這種和平是用武力維持的，不能表示心的團結。甘地傑是在我們不能到達的高處說話、思想和行動的，我們希望能夠到達那裏，但我們根本沒有那樣的能耐。他在那高處，不會受到憤怒或惡感的支配。他充滿著愛和感情。假若我們有他那樣一顆純潔的心，我們一定會知道個中的區別。因此，我們不能像他所喜歡的樣子去治理印度，我們必須要保持警察力量強大的軍隊。……有一部份回教徒會跑到甘地傑那裏去埋怨我最近的演說，因為我曾批評他們不斥責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問題的態度。他們還告訴了甘地傑許多事情，以致甘地傑覺得要替我辯護。那也使我痛苦，因為，我畢竟不是一個弱者，要讓別人代為辯護。」

「巴特爾接著又說：『甘地傑開始絕食時，我們就覺得可以把情勢弄清楚。因為，當我們正在揮金如土時，假若五百萬盾盧比的現金付款可以使得甘地傑稍微安心的話，為甚麼我們要吝惜這五百萬盾呢？我們希望這將從巴基斯坦方面得到一些反響，但是，假若巴基斯坦沒有反響，那過錯是在我們身上。我們不能不拉攏民衆，但我們也不能不造成甘地傑。我們看得近，他却看得遠。……我們必須要造成一種環境，使巴基斯坦可以走它喜歡的路，而印度也可以走自己的路。……我十分坦白的告訴你們，假若由於我在中央政府所做的工作而我被監禁的話，我一定表示歡迎。因為，根據我的經驗，我發覺監禁還要甜得多。』」巴特爾就這樣的領袖一樣，在爭取印度獨立的日子也會嘗過很多次鐵窗風味。

現在，也許我們可以說，在印度人民大眾中，希望有一個強大印度的都相信巴特爾；希望有一個強大印度，還希望有一個幸福世界的都相信尼赫魯；希望有一個印度教徒，回教徒跟錫克教徒的心裏都只有上帝而沒有撒旦，只有愛而沒有恨的則都相信甘地。至於那些不真正懂得非暴力抵抗的意義，只想到祈禱大會上去聽聽甘地的聲音，或者可能時摸一摸他的腳的人，他們對於甘地的虛信又另外是一種形式的。年青人大抵都會有一種感覺：假若莎士比亞沒有寫過哈姆雷特，也許別的劇作家在寫類似的劇本時會少一些顧忌。

從戰局看政局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世界上沒有單純的軍事，從每一個戰爭的起因歷程和結束來看，都含有濃厚的政治因素。所謂戰爭，不過是兩個以上的國家或集團有了不能解決的政治問題，而訴之於武力，但是打到最後，或輸或贏，還得是政治解決。心病還得心醫，解鈴繫鈴，是非常自然的道理。戰爭是人類歷史歪曲的道路，好像是庸醫亂投藥劑。因此，就是世界上的被損害被侮辱者，基於對歷史的仇恨，創造了鬥爭的理論，但是他也時常呼喚着「要麵包，要和平。」

中國的內戰也不例外是個政治問題。外是「政協」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極有光輝的標誌。可惜他曇花一現了，又被硝煙彈雨所粉碎了，使得中國歷史又倒退了十年。某內戰英雄對他的屬下知識份子說，「今後不准對政協一反省一下。」

類的東西，存有半點幻想。這話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的屬下知識份子難免還在憧憬着政協的光輝。歷史是不會重演的，用不到大先生諸談，政協過去去了，政協就不會再來；但是希望和平是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如何獲致和平，需要新的道路。

黃豆相煎的內戰打了兩年多，現在還看不到半點可以結束的跡象。過去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理論，到現在充分的證明是錯誤的，就不必說「短痛」不如「不痛」好吧，其奈短不起來何！「內戰一起，必然是長期化」，以前有人這樣警告過，但逆耳之言，是沒有人聽的，到今天相信三個月如何，六個月如何，乃至一年如何三年如何的人，是應該有所反省了。應該拋開意識，面對着中國人民的苦難，中國之命運，以及個人的政治生命，深切的反省一下。

的判斷覆電胡宗南祝賀之外，聞胡共軍實力損折如何，他說，如果朱毛兩人落荒而逃，弟部當有活捉力量，如果他們實力未受損失，整師北撤，榆林局勢更危，自衛不暇，遑云截擊，且以貴部數十萬眾不能在延安活捉朱毛，榆林一隅兵力，難做海底撈針之計。

共方宣稱從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後就不在解放區作戰了，而是在政府區作戰。他們更認為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是國內戰局的轉折點，從那時起，他們展開反攻，走向勝利，無雙的戰區是較前擴大了，國軍也有相當的傷亡，尤其在東北一次連接一次的攻勢，一次比一次大，長江之間，南北東西縱橫近千里，都有了共軍的蹤跡。這一個現實的局面，不能不使得原來計劃三個月怎樣，六個月怎樣的政府軍事當局有些焦灼。而且國內政治經濟的局勢，絕不容戰事久拖。第二線兵團的準備及軍事指揮機構的調整政府已經着手實施。去年陳毅出主事北行轅，去崇禪指揮華中軍事，傅作義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可以看做

置，大巴山設防，川軍東下，潘文華坐鎮宜昌，掩護三峽，做為防守的前衛。這一切措施，一方面是應付共軍今春的北打南竄。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分區負責下，展開一個春季攻勢扭轉過去半年來的頹勢。

據權威人士觀察，今年的戰局一定向南北兩端發展。共軍在他絕對優勢的東北地區，一定要趁着冰雪未融，鐵路港口不通的時候，加緊圍困瀋陽及東北其他各重要據點，使東北成為一盤死棋；然後秣馬厲兵向長城線內冀察地區進攻，打擊傅作義部。他們在宣傳今年要打下瀋陽做為總基地，打垮傅作義部，整個控制華北。目前東北共軍給華北立下的「下馬威」，是在這種目標下進行的。國軍要想轉振東北華北的局勢，只靠增設新的指揮機構和實施戰時體制是不夠的，必須再增加現有兵力的二分之一乃至一倍。所以北方的某政府人士說，「如將不如增兵。一是新增加的兵從那裏來呢？五大練兵區剛剛看到一紙命令，「新貨」不會很快的出廠，而且在兵源上也不是沒有問題。南方現有的兵力是沒有方法調過來的，共軍為了貫徹他北邊緊打的策略，一定在南邊緊竄，使國軍抽調不到北方來。從黃河到長江，這個廣大區中，經過去年半年的推磨兜圈，國共勢力交錯，糾纏在一起，誰也得不到休息與擺脫戰鬥。共軍已經將去年做為主戰場的山東丟在背後，浦濟軍可以暢通無阻，但山東的廣大農村還在共軍手中。遠離基地作戰的共軍可以實施「空心戰術」，國軍在很多地區甚至於單純的後方，也不得不需兵力警備。當然遠離基地的共軍，在補給上不無困難，最近劉伯承陳毅部隊的越隴海路北竄，也說明了他們的困難，是為了接近基地，接受新的補充。不過在他衝到國軍後方時，地方團隊很容易就被吃掉。一消滅地方團隊，拖死國軍一是共軍二陳一劉過黃河向南反攻的主要理想。現在國軍雖然不會拖死，而地方團隊却已經吃掉了不少。有名的宛西團隊也在鄧縣被打垮。

截至目前為止，共軍的兵源糧食都不成問題，可是攻堅的力量還是不夠。因為他沒有空軍和比較可用的重兵器。

，就是在他絕對優勢的東北也不能例外。這一點也可以說明，共產沒有得到什麼外援。他的主要的補給還是在前方。由於裝備及戰爭的性質，他不得不運用他特有的戰術，從他的戰術指導原則上，我們很容易窺測他的動向。放眼看戰局，我們覺得今年戰事一定要向南北兩端發展。——北邊緊打，南邊緊竄。

戰術決定於戰略，有人說共軍的戰略企圖是「鞏固東北，控制華北，鑽隙西北。」「突入江南，號召東南，影響西南。」果真是有這

樣的戰略企圖，也必然是一北邊緊打南邊寬竄呢？「共軍的戰術是什麼呢？他們深知劣勢裝備的部隊，打強強變弱，打弱弱變強，主要的還是運用游擊戰與運動戰，不攻堅，避免主力決戰，不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注意有生力量的轉換。先取小城市，打鄉村，運用造成的局勢絕對優勢吃小部隊，打下孤立據點。注意自衛部隊的休整，而同時疲勞及擾動對方。他們這一些戰術原則，國軍方面也不是不知道，而且各級參謀指導機關，也在細心的搜集資料加以

研究，籌劃對策。但是由於羣衆基礎不同，現在還看不出國軍有效的對策。穩紮穩打吧，動作遲緩，失去了機動性。利用碉堡吧，防禦了自己，也限制了自己。機動掃蕩吧，地雷地道，不得不搜索清除，不然共軍零整互換，來去飄忽，難免吃虧。要想以靜制動，現在不是抗戰前江西圍剿時期，要想以動制動，鄉村中的羣衆基礎不夠，而一般部隊的行軍力也不如共軍。經濟政治問題不談，在單純的戰術上就是一個極為困惑的問題。

管理理想的，北方地方人士及中央也相信只有他才或者能夠達成這個任務。可是「建上沒有奇蹟」，傳作義出任華北五省聯帥時，也說過這樣的話。由於他的聲望性高，華北現有各大城市及交通幹線今春或許不至於有大問題，在某種情形下平津也不見得比京滬危險。肅清華中的任務是比較更艱鉅一些。從黃河到長江，西起巴陝，東至海陵，縱橫千里，山嶽，平原，湖沼，雜然並陳。共軍在他的「三南」策略下，渡江入川為主要兩大企圖，他必然還是避

上外援惟一補給線之烟台等海口，獲得政略和戰略上的勝利。」可是這個政略與戰略上的勝利對目前的戰局有什麼影響呢？不過是多撐在身上的幾個包袱。由於戰略上的成功與勝利，更加重了戰術上運用的困難。

內戰開始時，國軍在戰略上要求南北合縱，爭取沿海。共軍要求東西連橫，丟開大城市，全面控制鄉村。經過去年陳賡劉伯誠陳毅的南下，八方風雨會於長州，從黃河到長江形成了軍事大轉盤，於是縱橫的戰略要求混亂了。

被共軍拿回去了。政府爲了解除京滬威脅用兵蘇北，蘇北的鄉團到現在還不安定。爲了打通南北通路，爭取沿海，進兵山東，到現在沂蒙山區還共有共軍，膠濟路依然不通，烟台威海衛外圍還有戰事。津浦路線徐濟段的通車，是在雙方經濟輸血的共同願望下，到現在倒還沒有問題。延安雖仍在國軍控制下，而中共中央還沒有離開陝北。至於東北共軍，在一年的七次攻勢中，使得鐵路寸斷，工礦破產，除了幾個富有象徵意義的大據點吉、長、瀋、四、錦

軍方面說，國軍傷亡失蹤近四十萬，國軍殲滅共軍在一年中有三個縱隊，兩個師，五個旅，擊破共軍十五個縱隊，十個旅，全年共斃傷共軍六十三萬八千名，被俘及投誠共軍十二萬七千餘名。合計爲七十六萬餘名。中國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先生，對於戰場上的傷亡有一個比較簡單而近於事實的算法，那就是將兩方宣稱的數字加起來再用二去除，所得之商就是接近事實的數字。共軍說國軍有生力量折損一百二十萬，（指正規軍）國軍自稱爲四十萬，那末

有定評。現在是萬物勃生的春天，然而春天並不會給中國人帶來新生與幸福，在今年的春季裏國內會有更劇烈的撕殺。這將是中國內戰的最高潮，但高潮之後也不會馬上結束戰爭。人民一時還沒有力量制止內戰的火熾，國際兩個壁壘對立下，對中國政局影響更壞，有的時候難免火上加油，使得中國情勢益形惡化。同時國內第三方面的力量在兩方夾攻下日趨削弱，所謂自由主義者也難形成一種力量。這一些悲觀的條件擺在人們的面前，向前看是一

非正式的消息，說國軍應付今年共軍「北邊緊打，南邊竄竄」的戰略，是要「肅清華中，鞏固華北，收復東北」。這一個新的戰略企圖，比以前所傳說的「守住東北，鞏固華北，控制西北」的調子並不高。謠言收復，不如守得住更現實一點，所謂收復是丟掉以後的事。現在具有濃厚象徵意義的吉，長，四，瀋，錦等大據點還在國軍手裏。鞏固華北無疑的是戰略上的守勢，當然在戰術上也可以攻代守，傳作義「以退為進」的軍政作風，擔任這個任務是非

免主力決戰，飄忽不定，主力是難以捕捉的，捕捉不住主力，肅清華中從何說起呢？國軍中或許到今年秋季得緊急號召肅清江南或華南。國軍戰略與戰術間有他的矛盾存在。戰略是大體固定了，戰術還須再加以研究與檢討。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中人士檢討過去，「在一戰局中，只好說，由總動員起，開始對匪進剿，首先達成克復共匪政治中心之延安，搗毀共匪軍事供應基地之沂蒙山區。打破共匪海

陝晉戰局與

胡宗南部

觀察特約記

(觀察西安通信)

以整個戰局發展趨勢來看，西北戰場已暫時被拋在後面，就是說，已經不是一個主要的戰場了。自從去年胡宗南部進攻，劉鄴兩軍以鉅形攻勢進擊延安，並攻取了國軍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累贅。共軍抽出了大部兵力西入山西，只留下少數兵力來「看着」延安，而國軍為了政治上的原因，也可以說為了面子關係，不得不以陝境的主力留在延安。在用兵上，國軍輸了一着。原來胡宗南部計劃的底定陝北，竟因為延安這個贅瘤，到今日還不能實現。相反的，共軍控制了晉南，由晉南渡江又壓迫了豫西，才發展成今日「八方風雨會中州」的局勢。

有戰略眼光的人，莫不以取延安為失策。九個月來的胡宗南，感到莫大的苦悶，培養了十年的精兵，在今日這種「觀戰」時代中，胡

健康的心理的部分表現。戰局用不到開，就是政局如果沒有新的開展，戰爭一時的輸贏，解決不了中國問題。中國一切的希望應寄托在人民的自覺上。

如果從戰局看政局，我們覺得今年中國政局有開展的希望，原因是人民已經普遍的有了覺悟，「長痛不如短」的理論已經不存在了，長期戰亂人民是無法再忍受的。同時春間就是一個戰局的大關鍵，三月二十九日召開國大又有延期的傳說，不論延期與否，三月廿九日前後，長江下游的大江南北，是要有戰事的。張軍內閣的十項自助計劃，是取得外助的香餌，也可以說是取得外助的外衣。記得張軍內閣登台時，據說他的一個老朋友問他靠什麼撐過危局呢？他說：「要靠三爺」。什麼是三爺呢？那就是兵老爺，洋老爺，天老爺。他希望兵老爺打勝仗；洋老爺給外援；天老爺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結果天老爺還幫我們的吏部天官的忙，各地的天災還不如人禍。洋老爺就有點不甚講情面，妮妮了一年，五億七千萬的外援才逐漸具體化。就是拿得

恐怕也在春夏之交。兵老爺如何呢？前邊已經談過戰局經過概況，這裏不必多說。雖然如此，「標榜一效率」，「民主」的內閣，在目前儘管不斷的受攻擊，一時不會更易的。就是以現在局勢為基礎，行憲大選以後，也還是有輝煌的可能。軍事上不會有奇蹟，政治上也不會

有奇蹟，說他沒辦法嗎？誰會有辦法呢？就是把發表公開嘲罵他的王續緒請上行政院的寶座，恐怕也幹不了三天。這個隨着戰局向下拖的政局，不會因為換上一兩個院部會首長而有辦法的，要有辦法得做根本的改革，需要人民真正能以自由的監督政府。政協的路是被一年多的砲火轟燬了，工人，學生，輿論界，須要勇敢的啓迪人民，使得和平要飯吃的民衆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從廣泛的民衆運動中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這個工作是更艱苦的，具有獨立人格的人為了人民要撐起十字架。目前政府的危機不在軍事而在政治，不過在軍事上表現出來的更具體。人民的自覺運動會隨着生活的煎熬日益普遍深入，某些人想箝制人民

民餓死鄉曲。仔細的想想，今天中國的局勢就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城鄉對立」。軍事上是城鄉對立，政治上是城鄉對立，經濟上更是城鄉對立。我們的張院長十項堂皇的自助計劃中，只有倒數第二條才提到了「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村經濟，實施土地改革……」真的假的？這不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陪襯。這一項最後還有輕輕的一筆是就「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建議中其提前實施者儘量提前實施」來向友邦送秋波。中共方面在戰時根據政府法令，在農村中實施二五減租，他能夠在敵後控制廣大農村，這是主要的原因。內戰開始後他才開始沒收土地，在嘗試着徹底解決中國土地問題辦法，當然這樣也解決了他們的兵源糧源問題，去年十月裏解放區召開了一個「全國土地法」，共區各地已經開始嚴厲實施。他們的注意力是大半用在鄉村，所以在鄉村中他有經濟基礎與羣衆基礎。政府將怎樣解決農村土地問題呢？現在還沒有具體辦法，即使有辦法也沒人去執行。因此城鄉對立的局面

只有日益加深，一方面是想以城市控制鄉村，一方面是想以鄉村圍困城市。將來是城市制服了鄉村呢？還是農村吃了鄉村呢？

城鄉對立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在政治上誰能調和城市與農村的利益，使他不至相殘而相成，誰就算是有了辦法，我們不要被砲聲震昏了頭腦，要理智的想一想問題。沒有不能結束的戰爭，從問題的基本上想辦法找出路，路總會有的。軍事問題的發生由於政治，政治問題的發生又由於經濟。城鄉對立的現象表現在軍事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各方面。中國需要和平，中國需要統一，和平統一的基礎應當建築在城鄉經濟的互相調和上，放眼看政局，還都是只顧了軍事的爭吵，而沒有人肯在這一點上下工夫。選舉的表演，香港的活動，在旁觀者看來，不知他們在搞的是什麼東西，他們是否也會考慮到這個迂闊一點的基本問題。

今後的戰局會更緊密而直接的影響到政局，但是戰爭並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二月十五。